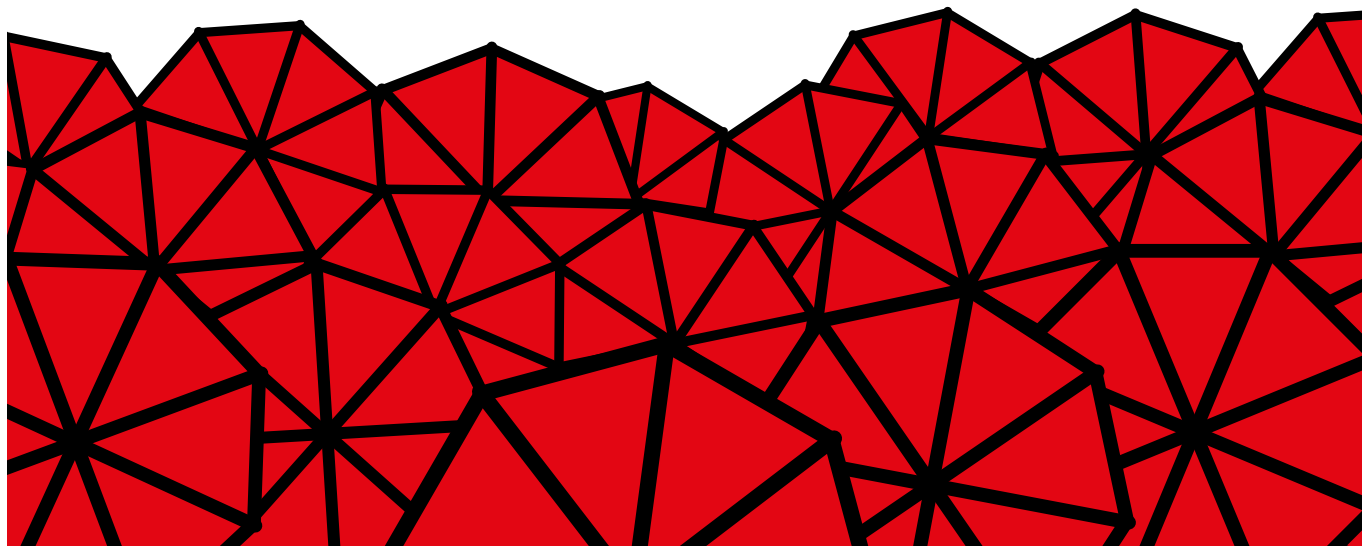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 关于性工作与  
性工作者错误  
信息的影响



# 关于性工作与性工作者错误信息的影响

## 介绍

长期以来,有关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一直是政治家,宗教领袖,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以及反人口贩运组织推进反性工作议程的工具。刑事定罪、污名、歧视和不准确的媒体表现形式,以及围绕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建立在迷思和刻板印象之上的社会和文化叙事,也都在添油加醋。有缺陷的研究和意识形态,有害且无效的法律、政策和措施都助长了对性工作者声音的持续排斥,对他们人权的侵犯。

**刑事定罪、污名、歧视和不准确的媒体表现形式,以及围绕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建立在迷思和刻板印象之上的社会和文化叙事,也都在添油加醋。**

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和剥削混为一谈是性工作错误信息的根源,助长了围绕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意识形态制定的反贩运政策。<sup>1</sup> 将性工作者的嫖客刑事定罪的“终止需求”模式、“突袭和救援”行动以及“退出”和“康复”服务进一步否定了性工作者的不同生活经历,同时模糊了真正的人口贩运受害者。<sup>2</sup> 围绕性工作和人口贩运的错误信息也导致执法部门和边境管制部门对性工作者的审查更加严格,以及促进针对性工作者的在线反人口贩运干预措施。道德评判和围绕异端和疾病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助长了有害的政策和做法,加剧了刑事定罪,并使性工作者远离重要服务。

本简报探讨了有关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最常见错误信息形式,以及它们对政策、研究、公共话语和性工作者日常生活的影响。本简报还探讨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如何抵制和挑战错误信息的策略。本文最后列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应对有关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的来源和影响。

## 方法论

本文基于2021年6月至7月在九个国家进行的深入研究:与NSWP成员组织的全球在线磋商,以及对国际人权,妇女权利,反人口贩运组织,捐助者基金会和联合国机构的关键知情者的访谈。数据为主,辅以桌面文献综述。国家顾问使用标准化问卷进行了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并编制了关于贝宁、巴西、中国、德国、圭亚那、新西兰、尼加拉瓜、坦桑尼亚和美国的国家案例研究。使用类似的问卷,与NSWP成员组织的全球在线咨询收集了来自15个国家的16个NSWP成员组织的答复。共有400多名性工作者参加了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其中包括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移民性工作者、性少数性工作者和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受访者代表一系列性别认同,包括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和男性,非二元和性别流动。受访者在不同的室内和室外环境中工作。

1 NSWP, 2020, “简报:关于性工作的错误信息。”

2 NSWP, 2019, “打击人口贩运立法和倡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 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和剥削

所有性工作都人口是贩运和剥削的一种形式，这个的普遍和有害的迷思被这次咨询的大多数受访者确定为**主要关切的问题**。这种观点经常被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反人口贩运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执法部门、媒体和宗教组织所推动，他们将性工作者描绘成需要“拯救”和“康复”的“受害者”。这种混淆导致有害政策和执法做法的扩散，并阻碍了国际决策和倡导平台中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保护。

**所有性工作都人口是贩运和剥削的一种形式，这个的普遍和有害的迷思被这次咨询的大多数受访者确定为**主要关切的问题**。**

### 将性工作者作为“受害者”的叙事

植根于受害叙事的反人口贩运项目基于“性奴隶”的迷思，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当时“白人奴隶”的概念成为控制妇女移民的一种手段。<sup>3</sup> 早期关于“性奴隶”的政策和法律为更广泛的文化叙事奠定了基础，这些叙事将性工作者二分法为罪犯或受害者。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利用这些历史叙事将所有性工作者描绘成“受害者”。这次磋商的许多受访者认为，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是最擅长把“性工作者描绘成受害者”的演说活动家，他们还促进“退出”计划和康复战略，而不是基于权利的服务和支持。尼加拉瓜的性工作者反映，尽管他们不断呼吁劳工权利，但一个当地人权组织试图通过为他们提供缝纫机和培训来“拯救”性工作者。

将性工作者描绘成被贩运，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族的影响，以及“文明”社会必须将“受害”妇女从“不文明”的种族社会中拯救出来的信念。这种说法已被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输出到世界各地。

**“对人口贩运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 [被强加于] 世界其他地区…… [根据废娼主义者的说法] 所有这些黑人，棕色和东欧妇女都是从所有这些国家被贩运出来的，并被卖到欧洲卖淫，因此需要被拯救和支持。”**

ISHITA DUTTA, IWRAW-AP 前项目经理

巴西的受访者反映，性工作者反对这种说法。

**“事实上自认性工作者女性感到不适，很多是因为废娼主义运动想要‘拯救这些可怜的女孩’……我们运动缺乏的就是自我确认、曝光。这是我的身体，我想用它做什么就做什么。”**

女性性工作者，巴西

将所有性工作者都描绘成“受害者”，影响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获取资助，助长了性工作者无力为自己组织或倡导的观念。这种迷思又得到了关于性工作者“没受过教育”或没有能力学习的刻板印象强化。

**“错误信息是该领域资源不足的原因之一。很多 [废娼主义者] 的叙事都是关于性工作者没有能动性。在组织层面，这种叙事可以转化为 [性工作者不能经营自己的组织或为自己倡导的观念]。”**

SEBASTIAN KÖHN, 开放社会基金会全球健康投资总监

3 NSWP, 2019, “打击人口贩运立法和倡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经常将性工作者描述为童年性虐待的幸存者，说他们被自己受到的压迫“蒙蔽”了。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经常将性工作者描述为童年性虐待的幸存者，说他们被自己受到的压迫“蒙蔽”了。这种病态和不准确的说法假设性工作者既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也不能为自己说话，通常被用来作为拒绝性工作者声音和代表性工作者说话的理由。<sup>4</sup>

媒体在传播有关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方面也发挥着核心作用，放大了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的观点、叙事和声音。在法国，性工作者指出，媒体“坚持[废娼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客观调查”。在圭亚那和新西兰，性工作者反映，媒体上关于突击搜查旅馆和酒吧的头条新闻固化了性工作者是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迷思。

**“人们立即认为所有性工作者都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女性工作者，新西兰

所有性工作者都是女性的相关迷思植根于“受害者”叙事的父权制起源，该叙事将“性奴隶”的所有受害者都描绘成女性。这种误解既加剧了对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和男性性工作者的污名，也使他们被隐身。在德国，受访者指出，在线广告平台只为顺性别女性或跨性别女性提供类别，而后者被性癖化被诽谤。德国性工作者指出，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也可能被贴上掠夺者、“偷窥”者的标签，甚至是伪装的嫖客，强化了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污名和歧视。

## 有缺陷的数据与研究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叙事以及耸人听闻的媒体将性工作者描绘成受害者，这些与有关贩运的有缺陷的研究相互启发验证。过分强调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问题的研究，以及充满混淆错误和有偏见的方法论，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数据收集正在以这种有偏见的方式进行，因为国家层面的执法当局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有数据……也就是说，性剥削是贩运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抓住了这一具体事实，而没有解决劳动剥削的背景，那我们是说他们是基于错误信息……还是说错误信息实际上来自国家层面，因为逮捕人口贩运的警察当局将贩运等同于卖淫和工作？”**

ISHITA DUTTA, IWRAP-AP 前项目经理

尽管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承认，由于性工作更加明显且经常被报告，<sup>5</sup> 统计偏差可能会扭曲对“性剥削”的衡量，但有关性剥削的统计数据往往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利益相关者还重新配置和操纵已经有缺陷的数据，以推进自己的议程并支持虚构的主张。例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一般性建议草案》<sup>6</sup> 以及2020年联合国妇女署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发表的《应对新出现的人口贩运趋势和COVID-19大流行后果》<sup>7</sup> 中使用了《2018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人口贩运报告》(TIP) 中重新配置的数据。在这些文件中，有选择地重新计算了2018年TIP报告中的一组4个数字，以夸大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数字。在决策空间内缺乏透明度和广泛使用有缺陷的“证据”不仅助长了错误信息的传播，而且助推了既不是基于权利的也不是基于证据的有害政策。

4 NSWP, 2014, “倡导工具包：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的真正影响。”

5 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sup>6</sup>

6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19年，“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草案。”

7 联合国妇女署和欧安组织，2020年，“应对新出现的人口贩运趋势和COVID-19大流行的后果。”

…性工作者报告说，“终止需求”模式增加了她们对暴力和警察骚扰的脆弱性，固化了污名和歧视，并减少了她们获得劳工权利、金融服务和住房的机会。

## “终止需求”模式与反人口贩运法律

将性工作者普遍描述为受害者，并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混为一谈，导致“终止需求”立法模式的泛滥。“终止需求”模式也被称为“北欧模式”，旨在通过将性工作者的嫖客刑事定罪来废除性工作和人口贩运。“终止需求”模式植根于错误观念，即认为所有性工作者都是有男性客户的女性，性工作是对女性的一种暴力形式。“终止需求”模式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和性别不平等。

研究表明，“终止需求”模式并没有减少性工作<sup>8</sup>或人口贩运<sup>9</sup>。相反，性工作者报告说，“终止需求”模式增加了她们对暴力和警察骚扰的脆弱性，固化了污名和歧视，并减少了她们获得劳工权利、金融服务和住房的机会。<sup>10</sup>“终止需求”模式

导致对第三方的刑事定罪增加，例如妓院经理，司机，清洁和保安人员，甚至其他共享工作空间的性工作者。<sup>11</sup>

有关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助长了旨在“拯救”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有害和误导性的反人口贩运举措。这些举措所针对的性工作者往往被视为罪犯或非法移民，而在其他领域（如农业和家庭劳工）工作的贩运受害者往往被忽视，很少得到报告。

近年来，在性工作者独立做广告的网络空间中，人们越来越关注反人口贩运举措，这导致了有害的立法，如美国2017年的《停止纵容性贩运者法案》(SESTA)和《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网络性交易法案》(FOSTA)<sup>12</sup>。FOSTA-SESTA已将性工作者用来宣传其服务，筛选客户和共享信息的在线工具和平台刑事定罪，借口是这些平台为人口贩运提供了便利，性工作者不值得拥有安全的工作空间。与此同时分类广告网站Backpage被抹杀。FOSTA-SESTA增加了性工作者遭受暴力的风险，并降低了他们安全和独立工作的能力。<sup>13</sup>

**“关闭Backpage就是拿走我安全赚钱的方式……我本可以在[Backpage]上做广告，因为它价格实惠。现在它消失了，我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安全地工作并吸引客户。”**

性工作者，美国

8 Jay Levy和Pia Jakobsson, “瑞典的废娼主义话术和法律：对瑞典性工作驱力和瑞典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

9 Susanne Dodillet和Petra Östergren, 2011年, “瑞典买性法案：声称的成功和记录的效果。”

10 NSWP, 2018, “终止需求”立法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

11 Bronwyn McBride等, “终止需求立法下第三方刑事定罪的危害：破坏性工作者的安全和权利。”健康与性行为, 23 (9), 2020.

12 美国政府, 2017, “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网络性交易法案。”美国政府, 2017/2018, “《停止纵容性贩运者法》。”

13 Danielle Blunt和Ariel Wolf, “被消除：FOSTA-SESTA实施和Backpage关闭对性工作者的影响上性工作者，反贩运评论13 (2020): 117-121.



## 国际政策制定和倡导空间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的立场和叙事在国际决策和倡导空间中激增,在国际法律和人权框架内围绕“卖淫”和“性剥削”的模糊语言的支持下。《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人口贩运的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都提到“意图营利使人卖淫”,但没有界定这一用语。此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6条呼吁各国“采取包括立法在内一切适当措施,禁止一切形式的贩卖妇女和以营利目的使妇女卖淫”,措辞含糊不清,可以任意解释。<sup>14</sup>因此,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不断曲解这些条款,以支持他们压制所有“卖淫”的反性工作议程。CEDAW委员会《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第38号一般性建议(2020年)》也表达了这种观点。<sup>15</sup>尽管性工作主导组织在整个磋商过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该建议仍未能充分区分性工作、性剥削和人口贩运。联合国各机构未能明确区分性工作和性剥削,使将性工作和人口贩运混淆的政策长期存在,并导致打击贩运措施的适用性过于广泛。

性工作和人口贩运的混淆,使得性工作及其盟友在国际决策和倡导空间内有效倡导性工作权利变得具有挑战性。<sup>16</sup>例如,在联合国空间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工作人员反映,在倡导性工作非刑罪化时,面临废娼主义团体的反对,并指出,只要倡导非刑罪化,就被描绘成促进人口贩运。此外,在联合国组织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个人立场也助长了错误信息的传播,因为歧视性和偏见的观点被描绘成“中立的”。例如,在联合国妇女署声称对性工作采取“中立”立场之后<sup>17</sup>,他们的前任执行主任在视频中说:

“作为联合国妇女署,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所有参与这个行业的女性都是受害者——无论她们是否认为自己是性工作,无论她们是否将此视为工作——我们将她们视为受害者,而购买服务的人都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施害者。”<sup>18</sup>

## 执法与管制

将性工作与贩运混淆,使性工作与执法部门打交道更多。当执法资金与打击贩运活动挂钩时,执法机构就会受到激励,进行“突袭和拯救”,以证明打击人口贩运的举措正在发挥作用。这些行动很少能有效地侦查和逮捕人贩子,反而使性工作承担法律后果,包括逮捕、罚款、拘留、驱逐移徙性工作者和被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将儿童带走。<sup>19</sup>

“来自Jinotega市一家夜总会的21名舞者在没有任何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被警方拘留。警方逮捕了他们,称他们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并将酒吧的老板和工作人员投入监狱,指控他们贩运人口和性剥削。所有的舞者都超过18岁,他们都自愿在那里工作。警察抢劫了他们的财物。我们不得不向当局施加压力,直到让警察释放他们(警察说他们没有被告或监禁,而是“受到保护”)。由于夜总会被关闭,他们失去了工作,其所有者和两名员工被指控刑事犯罪。”

尼加拉瓜性工作

14 联合国大会,1979,《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歧视公约》

15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20,“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第38号一般性建议(2020年)(CEDAW/C/GC/38)”

16 NSWP,2020,“空间萎缩与消声。”

17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对2019年10月17日全球信函的答复,2019年10月25日。

18 性工作教育倡导工作队,SWEAT对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Phumzile Mlambo-Ngcuka言论的回应,2020年7月23日。

19 NSWP,2014,“倡导工具包: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的真正影响”第4章。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工作人员反映,在倡导性工作非刑罪化时,面临废娼主义团体的反对,并指出,只要倡导非刑罪化,就被描绘成促进人口贩运。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受访者报告说, 右翼组织声称与执法部门合作打击不道德行为, 并恶意突袭妓院, 通过公开播放突袭镜头来曝光性工作者的身份。此外, 在突袭期间被拘留的性工作者将被罚款和逮捕, 移民性工作者被驱逐出境。在德国, 性工作者将前警察确定为错误信息的常见来源, 他们充当性工作的“专家”, 要求增加巡逻和伪装成“保护措施”的突袭行动。因此, 性工作者反映, 种族侧写、警察骚扰和暴力有所增加。

## 移徙性工作者和移民

政府利用对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的重视, 为日益严格的移民政策辩护, 包括歧视性的签证机制、逮捕和驱逐出境。<sup>20</sup> 在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 受访者反映, 移徙性工作者经常被认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在德国, 受访者说, 媒体经常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 90%到100%的性工作者是移民。这个迷思被用来主张更严格的移民政策, 以及支持用驱逐出境和拒绝居留许可来保护“受影响的人”的主张。这也导致突袭、种族侧写和对移民的歧视增加。

在新西兰, 尽管性工作在2003年被非刑事化, 但对移民来说, 性工作仍然被刑事定罪。这项规定导致移徙性工作者处于被剥削的工作环境, 使他们更容易被驱逐出境。<sup>21</sup> 受访者反映, 这项规定特别影响了少数族裔性工作者 (特别是那些亚裔)。人们刻板印象中认为她们愿意提供不受保护的服务, 因为他们违反了签证, 或者因为他们“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在圭亚那, 受访者说, 委内瑞拉和其他移民性工作者经常成为突袭旅馆和宾馆的目标。

对移民性工作者的严格监管, 加上将性工作者划分为受害者或罪犯的二分法, 导致一些性工作者声称自己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以避免法律后果。

**“在2000年代初, 在奥地利的保加利亚性工作者互相建议, 如果他们被警察抓到, 要说自己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那样他们会被送上回保加利亚的飞机, 也许还会得到一些钱, 而不是被投入监狱。”**

BORISLAV GERASIMOV, 全球反贩卖妇女联盟 (GAATW) 传播和宣传方案协调员

**…媒体经常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 90%到100%的性工作者是移民。这个迷思被用来主张更严格的移民政策, 以及支持用驱逐出境和拒绝居留许可来保护“受影响的人”的主张。**

20 NSWP, 2018, “移徙性工作者。”

21 Calum Bennachie等., “未完成的非刑事化: 2003年《卖淫改革法》第19条对新西兰移民性工作者权利和生活的影响,” 社会科学10:5 (2021): 179.

## 错误信息，刑事定罪，道德

### 错误信息与刑事定罪

当性工作者不被视为受害者时，他们往往被视为罪犯。当性工作者被视为罪犯时，她们经常受到侮辱，因针对她们的暴力行为而受到指责，并被剥夺了基于权利的支持服务和法律补救。

**…她们经常受到侮辱，因针对她们的暴力行为而受到指责，并被剥夺了基于权利的支持服务和法律补救。**

在尼加拉瓜，受访者说，性工作者由于与犯罪活动有联系，被视为“少年犯”和“对社会的威胁”。这导致了惩罚性的警务做法和执法部门的不实指控。

**“警察来了，突袭了我们几个人所在的地区，并说，‘你一定是向这里所有孩子出售大麻的人，因为你和其他妓女都是罪犯，’他们在街上对我搜身。”**

性工作者，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的性工作者还报告说，将性工作者认定为罪犯的做法使警察更加大胆地没收安全套，就好像携带安全套是犯罪一样。虽然携带安全套在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是犯罪，但在世界各地，它已被用作“卖淫证据”，以逮捕性工作者。<sup>22</sup>

在波兰，俄罗斯和美国，受访者报告说，性工作者通常被认为在皮条客手下工作。因此，第三方，包括妓院经理、保安和其他共用工作空间的性工作者，都有可能被刑事定罪，并被指控为‘皮条客’，从而增加被司法制裁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这种对起诉“皮条客”的强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唤起并强化了有害的种族化刻板印象。<sup>23</sup>

**“认为我们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被‘皮条客’控制的[迷思]……在很多层面上都是有害的：它被用来为”救援”和监视辩护，迫害我们的伴侣和朋友，支持认为我们有缺陷的迷思，将应召，妓院和同事刑事定罪。”**

性工作者，美国

在萨尔瓦多，受访者反映她们被视为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而在喀麦隆，纳米比亚和俄罗斯，性工作者反映她们被视为欺骗和抢劫客户的罪犯。即使在新西兰，性工作已非刑罪化，受访者也报告说，公众仍然认为性工作者不安全，与犯罪分子有联系，这固化污名和歧视。各地区的受访者报告说，这种与犯罪的联系被用来为虐待性工作者以及暴力，勒索和客户不付款辩护。

**“我们受到来自民众，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客户的侮辱，诽谤，恶劣待遇和各种暴力。”**

贝宁团结协会

22 开放社会基金会，2012年，“将安全套刑事定罪：警务工作如何使肯尼亚、纳米比亚、俄罗斯、南非、美国和津巴布韦的性工作者和艾滋病病毒服务面临风险。”

23 NSWP，2016，“第三方非刑罪化”



## “皮条客游说团”迷思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性工作者权利倡导者通常被指控为受到“皮条客游说团”控制和资助。<sup>24</sup> 这个迷思植根于否认性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对劳工权利的呼吁，被用来诋毁、诽谤和破坏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支持者。

在波兰，受访者报告说，主流媒体将迷思固化，将妓院突袭描述为“解散皮条客团伙”，而妓院往往更多是由女性经营的工作场所。在新西兰，新西兰劳工团体 (NZPC) 报告说，他们被控为“皮条客”或“帮手”，应该“为性工作者提供退出的计划”。国家丑脸 (NUM) 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报告危险客户的工具。它受到反性工作组织“北欧模式就是现在” (Nordic Model Now) 的攻击，该组织致函英国内政大臣，声称该组织“与皮条客有密切联系”。NUM威胁要起诉 Nordic Model Now，导致该组织撤回其指控。<sup>25</sup>

“皮条客游说团”的论点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支持，这些人要诋毁那些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人。2014年，当欧洲议会前议员 Mary Honeyball 提出一份报告，倡导成员国采用北欧模式时<sup>26</sup>，她将反对她报告的560个组织描述为“由皮条客组成”，写信给每个欧洲议会议员，敦促他们忽视反对者。<sup>27</sup> 尽管 Honeyball 报告充斥着不准确且很快被学者和研究人员揭穿的数据，<sup>28</sup>，但它得到了欧洲议会的批准。

“皮条客游说团”指控的最突出目标之一是大赦国际，该组织于2016年发布了关于《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者人权国家责任》的政策，呼吁将性工作的各个方面完全非刑罪化。<sup>29</sup> 该政策旨在保护性工作者免受暴力和人权侵害，并来自于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广泛研究和磋商，该政策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受到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的恶毒和误导性攻击。一个组织指责国际特赦组织“为虐待成性的皮条客和嫖客将女性身体作为商品进行交易铺路”。<sup>30</sup> 然而，国际特赦组织的政策受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人权捍卫者的赞扬，作为倡导工具，为其他组织采取非刑罪化政策铺平了道路。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资助者被迫应对与“皮条客”有联系的指控，以及说他们对剥削和暴力视而不见的指责。开放社会基金会全球健康投资总监 Sebastian Köhn 指出：

**“(我们被指控) 不关心剥削和暴力。我们没有看到性工作者遭受剥削和暴力，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开始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原因。”**

SEBASTIAN KÖHN, 开放社会基金会全球健康投资总监

24 Frankie Miren, “抱歉，英国性工作抗议者，没有皮条客游说团这样的东西”，Vice, 2015年11月2日。

25 Frankie Mullin, “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赦国际年度大会上的皮条客游说团” Verso, 2017年4月11日。

26 欧洲议会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委员会, 2014, “关于性剥削和卖淫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的报告 (2013/2103 (INI)).”

27 欧洲性工作权利联盟 (以前称为 ICRSE), 2016, “女权主义需要性工作者，性工作者需要女权主义：走向包容性工作者的妇女权利运动。”

28 “对“关于卖淫和性剥削的报告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的批评，由欧洲议会议员玛丽·哈尼博尔 (Mary Honeyball) 撰写，2014。

29 大赦国际, 2016, “国际特赦组织关于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国家责任的政策。”

30 “无特赦”，大赦行动。

**尽管Honeyball报告充斥着不准确且很快被学者和研究人员揭穿的数据，但它得到了欧洲议会的批准。**

## 污名与道德评判

道德评判和将性工作者描绘成不道德、有罪和异端行为的刻板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多个地区的受访者所注意到。这些观点强化了污名和歧视，助长了暴力，并被用来作为性工作者的家人、客户、执法部门和整个社会虐待性工作者的理由。

贝宁、圭亚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受访者反映了关于性工作者是引诱男性离开家人的“家庭摧毁者”的误解。这种有害的刻板印象导致了对性工作者的暴力攻击。

**“性工作者不被视为社会的正式成员，他们被鄙视，被唾弃，不被信任，被指控传播疾病，造成社会腐败，不道德和破坏婚姻。”**

俄罗斯性工作者论坛，俄罗斯

在整个非洲，性工作者报告说，社会认为他们被魔鬼附身或“被诅咒”。在贝宁，性工作者报告说，她们的性工作“甚至是许多献祭和暗杀的基础”。在喀麦隆，受访者指出，面临更多污名和刑事定罪的跨性别性工作者通常被称为“巫师，巫毒教徒，愿意与客户进行神秘实践的恶灵”。

受访者报告了错误信息对他们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如被亲戚回避。性工作者不适合当父母这一迷思对有孩子的性工作者构成了重大威胁，包括失去儿童监护权，获得儿童抚养费 and 福利的机会受到限制，以及被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任意干涉。<sup>31</sup> 围绕性工作的社会污名也可能导致作为父母的性工作者被排除在社群之外。

**“在我们那里，我被排除在所有当地活动之外……我的孩子也受到了羞辱，因为其他孩子被告知不要和他们一起玩……这迫使我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事情一天比一天糟糕。”**

坦桑尼亚性工作者

受访者还指出，所有性工作者都使用毒品的刻板印象是用来剥夺性工作者发言权的策略，就好像毒品使用者没有能动性，不会选择，不能代表自己一样。

**性工作者不适合当父母这一迷思对有孩子的性工作者构成了重大威胁，包括失去儿童监护权，获得儿童抚养费和福利的机会受到限制，以及被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任意干涉。**

31 NSWP, 2018, “污名和歧视对关键人群及其家庭的影响。”

## 关于性工作与健康的错误信息

围绕性工作者、性工作和健康的错误信息给性工作者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减少获得无歧视的高质量卫生保健的机会，增加社会污名，以及推动对性工作者人权侵犯的公共卫生政策。

### 性工作者是“疾病传播媒介”的刻板印象

来自NSWP所有五个区域的性工作者都反映，由于性工作者是“（包括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和 COVID-19）疾病传播媒介”的普遍迷思，因此受到污名和歧视。这种错误信息再加上移民、性少数、种族、原住民、艾滋病毒感染者或毒品使用者，影响更加复杂。

**“我的邻居，因为我是跨性别者和性工作者，称我为‘艾滋病缠身’，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在所有的性关系中都非常小心地使用安全套。”**

跨性别性工作者，尼加拉瓜

医务人员往往认为性工作者不负责任，无法照顾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在民主刚果，性工作者报告说，除了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外，性工作者还被视为埃博拉和 COVID-19 的传播者。在印度尼西亚，性工作者报告了家庭主妇会因丈夫与性工作者的关系中感染艾滋病毒的迷思。

**“关于艾滋病毒，性工作者总是被指责为导致传播的一个因素。”**

ORGANISASI PERUBAHAN SOSIAL INDONESIA (OPSI), 印度尼西亚

与这一迷思相关的污名和歧视也可能延伸到性工作者的家庭。

### 卫生政策与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将性工作者视为“疾病传播媒介”的观点影响了法律和卫生政策，进一步惩罚了性工作者，减少他们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性工作者是“疾病传播媒介”的迷思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一些国家，对从事性工作的惩罚被框定为公共卫生犯罪。

在将艾滋病毒暴露和传播刑事定罪的司法管辖区，这些法律过多地被用来惩罚性工作者。例如，在美国佛罗里达州，1986年至2017年期间，“性工作”导致艾滋病毒或性传播感染相关定罪的可能性是其他暴露事件的两倍，而个人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获释的可能性只有一半。<sup>32</sup>

**性工作者是“疾病传播媒介”的迷思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一些国家，对从事性工作的惩罚被框定为公共卫生犯罪。**

32 Williams 研究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2018，“佛罗里达州的艾滋病毒刑事定罪：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的刑事影响。”

…许多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避免通过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确认他们的诊断，也不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避免产生将来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的证据。

在中国，政策制定者、警察和公众压倒性地将性工作者视为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主要传播者，导致国家对性工作者进行严格监控，并制定严格的艾滋病毒暴露和传播法律。性工作者意识到自己艾滋病毒阳性状态可能导致被拘留并被指控犯有两项罪行，即使他们的病毒载量在抗逆转录病毒（ARV）治疗后无法检测到。因此，许多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避免通过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确认他们的诊断，也不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避免产生将来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的证据。

**“一名性工作者因违反《艾滋病毒传播法》而被判刑，尽管她多年来一直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并且在与客户发生性关系时确实戴了避孕套。”**

性工作者，中国

将性工作者视为“疾病传播媒介”的迷思也固化了有害的强制性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检测和治疗政策，这不仅侵犯人权，而且促生了不信任，加剧了获得卫生服务的障碍。<sup>33</sup>

## COVID-19大流行

COVID-19大流行加速了有关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的传播，并加剧了他们的边缘化。在性工作被刑事定罪和不被承认为劳动的情况下，性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机制之外。<sup>34</sup> 在德国，性工作者反映，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她们经历了新的性工作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在德国监管体系内合法工作的注册性工作者与未注册的性工作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公众开始将性工作者视为病毒的潜在“超级传播者”，一些注册的性工作者要求被视为“干净”的性工作者，将自己与未注册的性工作者对立起来，后者不仅被排除在国家社会保护措施之外，而且如果他们继续工作，将面临更多的刑事定罪。

学者们还试图将性工作者描绘成COVID-19的“超级传播者”。2020年，由哈佛医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科学家撰写的一项研究错误地声称，继续关闭印度的红灯区可以预防72%的新增COVID感染。<sup>35</sup>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公共卫生专家和其他人权捍卫者提交了一份反对这项研究的请愿书，指出该研究是基于对印度性工作的错误理解，缺乏透明的方法，并且是在没有征求性工作者社群，民间组织或学术同行的意见的情况下制定的。耶鲁大学随后回应说，他们将审查这项研究。尽管如此，性工作者报告说，在研究以方言发表并由当地媒体讨论后，警察骚扰和威胁有所增加。<sup>36</sup>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通过强化性工作者是疾病传播媒介的迷思，这些误导性的声明加剧了污名和歧视，增加了遭受暴力和虐待的脆弱性，并在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侵犯了性工作者的人权。

33 NSWP, 2018, “性工作者的全面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可及性”

3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20, “在抗击新冠疫情时绝不能落下性工作者。”

35 “印度可以通过关闭红灯区域来避免72%的Covid病例: 报告”, 《印度时报》, 2020年5月16日。

36 Preetha Nair, 面对强烈反对, 耶鲁大学将审查关闭红灯区域以遏制COVID的研究建议, 展望印度, 8月2020。

##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应对和挑战错误信息的策略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已经制定了许多策略来挑战错误信息，迷思和刻板印象，首先是重新定义和重新构建有关其工作和社群的叙事。各地区的受访者指出促进多样化叙事的重要性，用叙事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的现实和力量。

**“我认为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叙事和性工作定义。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分享有关行业风险的信息...然而，现在是我们改变观念并与世界分享我们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了.....[改变]对我们的理解，[看到]性工作可以成为什么样，或现在是什么，相当有益。”**

人人平等权利运动，纳米比亚

许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通过努力增加性工作者对媒体中有关性工作的叙述的影响力来挑战错误信息。例如，北马其顿的STAR-STAR制定了自己的沟通协议和公共关系流程，以避免媒体错误引用或断章取义。在印度尼西亚，OPSI任命了一名社群发言人来教育媒体和记者。

**“作为一个组织，我们通过任命一名来自社群的发言人来制定内部战略，该发言人可以对媒体进行教育和讨论，改变记者的观念，以便对性工作者进行人道的报道。”**

OPSI，印度尼西亚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盟运动有能力改变公众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的看法。**

许多受访者还强调了倡导运动和建立联盟在打击错误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与媒体、政府官员、卫生部门、执法部门以及妇女和反贩运运动等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各地区的受访者指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盟运动有能力改变公众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的看法。

**“我们需要主流媒体和政党的盟友，他们可以让我们的信息获得宣传.....我们需要有友好的记者，与我们合作制作高质量的文本和材料供给媒体。”**

波兰性工作，波兰

最后，受访者指出，在性工作者社群和公众中积极推广准确和公正信息的重要性。所有NSWP区域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都使用自己的线上线下平台发布准确和公正的信息，挑战错误信息，并加强性工作者社群的能力。

**“我们策划运动和小册子，我们在几个城市的街道上展示横幅和广告牌，我们为与性工作有关的特定活动组织游行和集会，我们为国家和地方电视频道提供采访，参加会议以及区域和地方论坛，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们质疑错误信息，迷思和刻板印象。”**

尼加拉瓜性工作者



社群主导的研究已成为许多性工作主导组织挑战错误信息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NSWP及其成员和其他性工作权利活动家和团体开发了无数资源和宣传工具，反映了不同性工作社群的生活经历。这些资源既应对性工作人权面临的长期障碍，也用于处理新出现的威胁。例如，性工作团体Hacking//Hustling对FOSTA-SESTA和其他针对性工作者的数字干预措施进行了原创研究，以证明它们对性工作者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的影响。<sup>37</sup>

## 建议

以下建议来自于与世界各地NSWP成员组织进行的咨询。

- 推动性工作各个方面的全面非刑事化。除了损害性工作的人权外，刑事定罪还固化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有害和错误的叙述和刻板印象。
- 促进对“性剥削”进行明确、毫不含糊的定义，将其定义为一种有别于性工作的现象。贩运人口、剥削与性工作的广泛混淆，以及“以营利为目的使人卖淫”的概念定义不清，强化了错误信息，助长了有害的立法、政策和措施。
- 承认性工作是工作。将所有性工作视为剥削或贩运的“受害者”，剥夺了性工作者的劳动权利和能动性，阻碍了打击贩运的斗争。
- 优先考虑和扩大性工作者在政策和方案决策平台、民间组织和媒体中的多元声音。赋予性工作讲述自己故事和控制自身相关叙事的能力。
- 开展教育、倡导和意识提升运动，积极挑战有关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这些运动应由性工作发展和主导。
- 有意义地让性工作参与设计、实施、审查性工作相关学术和科学研究的所有阶段。确保所有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研究都以公正的方法为基础，不混淆性工作与贩运和剥削。
- 优先考虑和重视性工作主导的研究产生的证据。作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专家，性工作处于理想的位置，可以进行准确反映其社群生活经历的研究。

## 结论

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植根于刻板印象、意识形态和有缺陷的“证据”，长期猖獗蔓延。广泛混淆性工作与贩运和性剥削，加上将性工作描绘成受害者、罪犯、异端和“疾病传播媒介”的叙事，助长了有害和误导的政策和做法的扩散。与此同时，挑战错误信息的社群能力和证据基础前所未有的有力量。随着对性工作人权的新威胁不断出现，赋予性工作控制关于自身叙事的能力仍然至关重要。

**随着对性工作人权的新威胁不断出现，赋予性工作控制关于自身叙事的能力仍然至关重要。**

37 “关于” Hacking//Hustling。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 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 包括但不限于: 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 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 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18-29岁之间); 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 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 残障性工作者; 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http://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 SC349355

项目支持:

